

浅论意识形态及其在当下中国的困境

许振洲

内容摘要 当前,中国社会中笼罩着一种缺乏超越性目标的成功主义的意识形态。物质意义上的成功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成为人们生活的价值与意义,成为合法性的基础。它与正式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平行存在,并对其形成了事实上的解构。这种意识形态无法经受检验,没有普遍意义,不能弥合社会矛盾,不符合民主及社会主义的潮流,更与一个合格的意识形态的所有功能性要求背道而驰。如果不能摆脱其束缚,则我们的一切成就都很难产生对内的凝聚力及对外的吸引力。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意识形态 困境 成功主义 超越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世所公认,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奇迹亦不过分。府库的充盈自然会提升人们的自信心,“21 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中国的崛起”或“和平崛起”等不仅仅是民间的感性期许,已成为学术界热门话题。对中国的发展前景,若干适时凑趣的国际人士或是居安思危的夸张、或是顺水人情的恭维,更是使这种乐观主义情绪如同“烈火烹油、鲜花著锦”。

然而,此时我们需要的,可能正是有煞风景却可以让头脑冷静一些的“盛世危言”。我们的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经济成功是否意味着一切,能否与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同步?财富的分配是否符合正义的原则,惠及一般百姓?狄更斯《双城记》中“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的名言会不会不幸而言中,成为我们

* 许振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时代在一个角度上的写照?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感慨道“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①这多少说明了盛世中问题的存在,或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揆诸历史,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除人口幅员、资源物产、经济军力等必要因素外,无不伴随着一个对内有凝聚力,对外有感召力的意识形态。一个时代的标识,固然可以是电气化或计算机,但更经常的是某种政治—社会理念。在多数情况下,思想的影响远大于财富或武器。韩非式的“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韩非子·显学》)或马基雅维利式的“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②的判断未免过于短视。一个真正的大国输出的绝不只是物美价廉的商品,更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③

这恐怕也正是目前中国的最大不足:我们的意识形态给人的印象是不够连贯清晰,不够气势逼人,特别是取向不高,缺乏必要的超越性。人们讨论更多的是中国的商品、高铁或航母,而不是我们的思想或价值观。



自从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1801年发明“意识形态”这个词后,学术界对该概念的定义几乎不胜枚举,而褒贬更是泾渭分明。笔者无意在此对这些定义详细梳理,只想对两派的代表性观点做一简单归纳,并着重说明本文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特拉西本人是从纯粹学术、学科分类、完全中性的角度首次应用这个概念的。他所说的意识形态(idéologie)是普遍意义上关于思想、观念(idées)的学问。^④不久,拿破仑在与贡斯当的争论中便将后者的自由主义理念贬为“意识形态”即不切实际的空谈。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贬义理解流传颇广,至今仍有影响,甚至成为主流

① 《温家宝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讲话》,新华网2011年4月17日。

② (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7页。

③ 法国甚得人望的前总统希拉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法国具有强烈的独立愿望,在其他民族眼中有着重要地位,大家期待并倾听它的声音。它拥有人道主义的视野和理想,并负有使命去传递这份遗产,去表达一种抱负,一种超越其自身利益思维的抱负。”参见(法)雅克·希拉克《步步为赢》,李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法国人的沙文主义常常惹人厌烦,但法国又确实是当今世界价值观的主要输出国。

④ 法国哲学家拉朗德(A. Lalande)在20世纪初同样认为,意识形态是有关思想观念的起源及规律的科学。

定义。^①法国《罗伯特(Robert)词典》对它的解释之一便是“对空洞思想的分析与讨论,模糊晦涩的哲学”。

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大致有两个理由。第一,它不是真相或真知,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经常是错误的理解或想象,是对真理的错误认识。这种批评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概念。柏氏在《理想国》中将人们的思想观念分成两部分:理性与意见,其中理性包括知识与理智,意见是信念与猜测或想象。理性所处理的是本质,而意见处理的是生成。“理性与意见的关系就好像本质与生成的关系,知识与信念、理智与想象或猜测的关系就好像理性与意见的关系。”^②这里的“意见”其实就是后来贬义的意识形态。一般愚人无法认识事物的本质,无法掌握基于知识而非基于意见的真理,一如洞穴中的囚徒,经常把火光投射下产生的幻影当作真相。而哲学王的使命便是让他们摆脱这种“意识形态”的迷惑。在《泰阿泰德篇》中,他更加系统深入地分析了知识与感觉、印象(意识形态)的区别,明确指出“我们不承认知识就是感觉”,^③正如太阳永远不等于阳光下形成的各种物体的影子。现代人对意识形态的非真理性的批评则更为直截了当,卢卡奇认为:“所有意识形态都是一种概念化了的神话”。^④法国学者莫内罗(Monnerot)指出:“意识形态其实是……一种功能性的神话”,^⑤在最好的意义上讲也不过是哲学的一种通俗化,而更经常的功用则是宣传(西方对“宣传”的贬义理解便是对真相的歪曲)。第二,意识形态只是一部分强者、统治者的思想,是他者的思想,但却自我标榜为社会全体成员的思想,不无宣传乃至欺骗之嫌。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是他人或毋宁是我们对手的政治思想,是对手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向我们做的掩饰、歪曲乃至欺骗。“人们在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随时随地向他们的对手表示的不信任和怀疑,都可以被看作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直接先驱。”^⑥阿隆也曾调侃道:“‘意识形态是我对手的思想’这句话是对意识形态的最不糟糕的定义。”^⑦

马克思与恩格斯被学术界公认为意识形态研究的先驱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他们实际上对意识形态的上述不足已做了深入分析。一方面,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厘清了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强调了后者对于前

① “当拿破仑发现这群哲学家反对他的帝国主义野心,并且轻蔑地称他们是‘意识形态专家’的时候,现代意识形态观念就出现了。从此以后,这个语词就带有了某种贬义,而且它就像‘doctrinaire’(空论家)这个语词一样,一直把这样的贬义保持至今。”〔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② 柏拉图《国家篇》,载《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6页。

③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同上书,第709页。

④ G. Lukacs, *Histoire et conscience de classe*, Paris, Ed. de Munuit, 1960, p. 238.

⑤ J. Monnerot, *Les faits sociaux ne sont pas d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46, p. 208. 转引自 M. Vadée, *L'idéologie*, Paris, PUF, 1973, p. 14.

⑥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第71页。

⑦ 转引自法语维基百科“意识形态”条目。

者的决定作用,社会意识只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①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经常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②但这个阶级,特别是“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③

当然,即使是在完全承认上述批评的前提下,人们对意识形态也可以有另一种相对中性、温和的理解,特别是在考虑到它的社会功能的时候:意识形态可能远非世界的本质,可能受强势集团影响操控,但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是否又发挥着某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阿隆指出,我们在日常应用中可以观察到,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有一种“在中性理解和贬义理解之间的摇摆。在贬义或批评意义上,它是错误的思想,是对利益或情绪的合理化。在中性意义上,它是对政治与社会现实的一种相对严格的理论化,一种对现实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相对系统的解释。”简单讲,“意识形态是对历史与政治世界的总体性解释体系”。^④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第二性及阶级性,但并未否认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是各种社会观念——政治、经济、司法、教育、道德等等——的集合,反映了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决定大众的行为规范乃至世界观,构成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同时,20世纪的一些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做了进一步讨论,其中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与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分析最为精彩。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的地位不仅仅依靠国家政权暴力的支持,意识形态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通过宗教、教育、文化、风俗等柔性手段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融化为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形成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反之,“每一次革命都是以激烈的批判工作,以及在群众中传播文化和思想为先导的,”^⑤是合法性的坍塌。一般来讲,“一个经济阶级领导的政府的倒台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便是)这个经济阶级不懂得创建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以行使专政之外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② 同上书,第550页。

③ 同上书,第552页。

④ R. Aron, *Trois essais sur l'âge industriel*, 转引自 M. Vadée, *L'idéologie*, pp. 16-17.

⑤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领导权。”^①阿尔都塞在马克思关于“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②的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③它包括宗教意识形态、伦理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等,即各种世界观。在意识形态中,“人们以想象的形式对自己表述了他们的实在生存条件”^④尽管这些想象可能远非真相,尽管它们为历史的、具体的人的生存环境所决定。这种理解与阿隆对意识形态的中性定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代法国左右两派知识分子的代表在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

本文也是在纯粹中性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分析它的社会—政治功能,讨论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应当具有的特征,而将物质与意识孰先孰后的问题暂且放在一边。

二

我们重申世界是物质的,是可以被认识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经常看到,对同样一个客观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对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和解释。对于自然现象的认知差异,随着科学、技术、传播手段的发展可能会逐渐消失。但对于社会现象,人们的歧见似乎并未因时代的变化而呈线性减弱趋势。^⑤

阿隆与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实际上,中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对自己的存在、对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认识系统、解释系统。这种认识并不一定具有真确性,又总是为认识者自己的社会环境所左右,但却决定着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取向乃至习俗风尚。人的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其实便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接受过程。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多种分支,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意识形态在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功能是值得充分重视的。

对于个人来讲,意识形态首先提供了系统的价值体系,解释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行为的理由,满足了人们证明自己的价值与行为合理性的需求,并使其得以确定

①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书简》,田时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前引书,第524页。

③ (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2页。

④ 同上书,第353页。

⑤ 正因为如此,我才对“政治科学”的理想持相当的保留态度:如果不能形成各种定理式的共识,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政治学为科学?

自己的追求目标,规范自己的行为。进一步,意识形态给人们提供了认识与解释外部世界、社会现象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模式,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形成自己的意见,确定自己的立场,计划自己的行动。一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①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限制,能够认识真相的人往往不占多数,“洞穴囚徒”的真正解放尚需时日。所以意识形态的上述功用又是无可替代的。柏克曾大力为“偏见”辩护(相对于启蒙主义的理性,他笔下的偏见其实也是意识形态):“偏见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得以运用,它事先就把我们的思想纳入一种智慧和道德的稳定行程之中而不让人在决定的关头犹豫不决、困惑、疑虑以及茫然失措。偏见使一个人的美德成为习惯,而不致成为一系列毫无联系的行为。正是通过偏见,一个人的责任才成为他天性的一部分。”^②他自豪地认为多数英国人民自然淳朴,珍视自己古老的观念体系,并将其作为决定自己反应的根据。相反,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对所有事情都要进行欧陆式理性思辨的努力,不仅无益,而且危险。

在政治层面上,意识形态提供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目的、主要规则、权力性质及其运行方式、利益的分配原则等方面的共识基础。当这个基础相对牢固时,统治者的权力便有了较大的合法性,比较容易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韦伯在谈到合法性(或译“正当性”)对统治者的重要性时说:“如果管理干部和支配者之间的结合,是以纯粹的物质利益或利害关系为基础,这个结合必然不十分稳固。……每一个支配系统都企图培养及开发其‘正当性’。而由于正当性基础的不同,连带地也导致了不同的服从形态、不同的行政系统,以及不同的支配方式。而其效果当然也有基本的差异。”^③意识形态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解释系统,那么合法性便主要是被统治者对权力关系即支配关系的认识及解释。尽管这个合法性理论可能为统治者所建构,并主要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当它设计得比较巧妙、在社会上形成共识时,被统治者对于与其自由天性相悖的支配关系就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社会气氛因之和谐,统治者的支配成本因此而更低、更加有效。孟子有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④这里的“德”,其实便是合法性。

在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塑造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及行为规范,培育了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及相应的风尚习俗。在这方面,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其实是在共同努力。一切最终成为社会典范的圣人智者之言,莫不有赖于政治权力的支持。至少在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前引书,第509页。

② (法)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7页。

③ (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II,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④ 《孟子·公孙丑上》。

国,“教化”从来是国家的重要功能。

正是出于对意识形态诸功能的重要性的认识,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 I. E.,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这个概念,作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补充。^①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机器包括了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这是镇压性国家机器,通过暴力发挥其功能。但其实与它平行的,还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党、工会、传播、文化等。^②它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运用发挥功能。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可以较为迅速地掌握镇压性国家机器,但未必能够同时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在这些领域中可能仍然保留相当的影响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要作用在于实现“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使人们认同、服从于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并使它们得以延续、复制。

因此,从这种中性的、特别是社会功能的角度观察,对意识形态的各种质疑其实都可以得到解释。

对唯物主义者来讲,物质无疑是第一性的,而意识只是对它的反映。我们不必激进地宣称意识形态也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③甚至“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④而只需认识到,第二性的东西并非没有存在的价值,尤其是考虑到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的时候。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把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的各个领域概括地分为三类: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⑤……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⑥

关于意识形态只是一些虚假观念与错误认识,不是知识,不是理性,或者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不是科学的批评,可能的回答是:且不谈在认识论的角度上真理能否被认知,甚至从本体论的角度上真理是否存在尚聚讼纷纭。仅只在何谓真实观念,何谓正确认识的问题上,人们就很难达成一致:谁是标准的制定者?谁是真理的判断者?过去的权威来源,如势位、道德、学识或年齿,在当今民主即人人平等的时代,已经不太有说服力。对于一种思想,服膺者人数多寡比其是否为真知更为重

①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334—335页。

② 阿尔都塞指出,这个理论继承了葛兰西关于国家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国家机器,还应包括若干由“市民社会”产生的机构的观点,并加以系统地讨论。

③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8页。

④ (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356页。

⑤ 又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谈及的“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前引书,第535页。

⑥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28页。

要。至于意识形态是否科学,辩者或可如福柯般精细,分析二者之间的可能相通相容;^①或可如阿尔都塞般直接,说明二者功用不同,无法也不应进行简单的优劣对比。科学高于意识形态的信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②在阶级社会中,人是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说法从来不曾得到验证,自然不够科学(优生的前提恰恰是人生而不平等)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但正是这个信念与生产方式的变革一起,推动了整个世界的民主化浪潮。

意识形态有它的阶级性:人们归根结底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认识及解释世界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确实在社会中更容易占据统治地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旧社会”中揭露这一点,对于提高被压迫阶级的阶级觉悟是十分必要的。但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特别是当我们已不再认为阶级斗争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我们是否需要建构一个能够统和社会最大多数成员利益的意识形态,以成为和谐社会的基础与氛围?换句话说,在非阶级社会中,人们是否能够抛却意识形态?

因此,在给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认识、解释系统,使他们得以自处及相处的意义上,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是无可疑的。人们会厌恶拙劣的意识形态,但不会拒绝设计巧妙的意识形态。因为曾经有过拙劣的宣传就不去探索巧妙的宣传,因为曾经不吸引人便不再试图去吸引人,实际上是主动放弃了阵地,任由他人的宣传来占领。在这个领域中不可能有长期的真空,只是谁来填充的问题。正如一个有需求的市场,如果你不能提供适当的供给,便自有人来提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西方国家阶级关系的变化,意识形态终结的预言开始时髦,并几乎成为共识。^③但从上述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出发,从对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出发,我们又可以肯定意识形态远未过时或终结。终结了的只是某些意识形态,而不是意识形态本身,除非我们能够找到其功能的替代者。^④

① “意识形态不排斥科学性。……一个话语在进行自我修正、纠正错误、加速自身形式化时,并不必然同意识形态脱离关系,而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不随着严密性的增长和差错的消失而减少。”〔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1—242页。

② “只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才能想象出无意识形态的社会,才能同意这样的空想:意识形态(并非其某种历史形式)总有一天会被科学代替,并从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空想实际上是认为: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的伦理学可以为科学所取代或变成百分之百的科学;……艺术可以和认识浑为一体或者成为‘日常生活。’”〔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28页。

③ 可参见〔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 “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意识形态是永恒的。”〔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351—352页。

三

从上述中性定义的角度考察,1949年以后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革命性的,是以否定以往观念为前提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它的宏愿是“重建社会”。^②在以往观念的废墟上,它向人们提供了全新的、成体系的对历史与世界的认识与解释系统,如阶级分析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及目标: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揭示了我们存在的价值:旧社会的埋葬者及新社会的建设者。在此基础上,也衍生出了共产主义的道德观、价值观,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与不能做什么。

这种意识形态具有一切成功的意识形态的标准:明了简捷,逻辑性强;有很强的排他性和进攻性;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及可信的实现手段。自诞生后,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包括欧洲,取得了迅速的成功,显现出了强大的吸引力。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欧知识界中“政治正确”的标准都相当偏左,令人印象深刻。

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其实具有相当的超越性。它不仅意味着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而且要求人们的精神觉悟有极大提高,成为一代新人。但是这种理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又多少受到了本土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征是它的世俗性即非宗教性。国人普遍重今生而轻来世,对彼岸世界的探讨缺乏兴趣(孔子即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③),也不大承认先验(transcendence)观念。面对自然的严酷及命运的无常,我们会有惶惑与感叹。所谓“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④但化解之道很可能又物化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⑤

我们在对共产主义的宣传中未尝没有强调目标感、使命感及人的升华,但在上述传统的影响下,受众还是更容易将其理解、简化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或“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恐怕是现代中国少有的一次直接实践共产主义的尝试,其中的这种现世主义倾向亦颇为引人注目。当时山东范县的一首民歌是个很好的例子:“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272页。

② 同上书,第543页。

③ 参见《论语·先进》。

④ 参见《古诗十九首》。

⑤ 曹操《短歌行》。

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要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①这多少说明了一般民众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知。

如果说在文革结束前,对这种“人间乐园”的憧憬还只是若隐若现,并经常被批评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社会的主旋律还是为共产主义理想与世界革命艰苦奋斗,破旧立新,发扬大寨与大庆精神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的总体风貌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严格地讲,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从来没有动摇: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的方针不断受到强调。但在实践中,大力发展经济,迅速增强国家的有形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了国家当下的主要任务。一般民众则将这种倾向进一步放大,一直受到限制的世俗精神得到了充分释放。在相当程度上,这些目标已经成为我们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成为社会中通行的意识形态。

笔者无力完整准确地描述这种社会心态,只能尝试着做一些个人的观察与分析。这是一种成功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功既是一切的目的,又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成功的内容是广义的、多方面的,从政府层面的国民生产总值总量及发展速度、外汇储备、城市化进程、大型庆典的举办等,到个人层面的升官发财、事业有成^②及富足奢侈的生活。所谓成功可以相当精确地测量:或是盖了多少楼,修了多大的广场;或是当了多大的官,有多少收入与财产。这种成功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物质、现世的基础上,而不具备明确的超越性:我们不十分关注各种不能具象化的目标,无论是政治共同体的前途,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模式,还是个人的真正价值及生活的意义。社会中的价值取向因而高度简单化,成功可以解释一切,一切与成功

^① 更详细的版本是“各种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与休息。能产钢铁能产布,能造化肥发电机。拖拉机汽车也会造,生产用品样样齐。果品罐头范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收音机,使用起来真便利。”“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絮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欢了不得。”“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各种生产用机器,劳动学习娱乐三八制。出门坐上电汽车,到处花香真扑鼻。室内室外公路电灯化,有事摇摇电话机。定时广播有喇叭,饭前饭后开开收音机。北京上海好戏随便听听它。”“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要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这是山东范县党委书记谢慧玉在1958年10月28日万人大会上关于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载中宣部《宣教动态》1958年11月4日。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221页。两天后,毛泽东主席对此件做了意带肯定的批示。

^② 我们早已不再像古人那样将事业视为圣人的专利。“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参见《易经·系词》。腐儒的懒祭固然是事业,奸商的为富不仁也常以事业自诩。

无关的秉持或努力都没有意义。

在人类的意识形态史中,似乎很少观察到类似先例。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这种缺乏超越性的成功主义是否可以算作意识形态。但它又确实满足了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它提供了一个目标,形成了对世界的解释体系,阐明了人的价值,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及如何去做。所以只能说,这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意识形态。它与正式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平行存在,并对后者形成了事实上的解构。

这种成功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其朴素务实的一面。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上下一致希望过一个好日子热情有直接关系。但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它又有其内在的不足。在人民的最低物质需求已得到基本满足的今天,这种不足暴露得更为明显。

首先,它承担着过于沉重的受检验的义务而又注定经不起检验。我们知道,意识形态及作为其一部分的合法性理论,是人的思想、认识,在表面上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只要受众相信它、接受它,它就是成功的。但实际上,一切意识形态又都面临着检验的问题。如果它能经受住检验,就是稳定的,就有生命力;如果它很容易在实践检验中遇到问题,就有可能出现信任危机。

成功主义意识形态许诺的是现世乃至当下的幸福。因此,它所承担的受检验义务过于直接,标准也过于清晰:我们必须保证并不断证明自己是世界上发展最快,或者是最富的国家,否则就会受到质疑。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种意识形态能够通过这种检验。我们如果是次富的国家,是否就不如最富的国家?我们今天是最富的国家而明天排名第二了,是否就意味着大事不妙?我们的传统宣传中曾经过于强调社会主义象征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而忽视了社会主义理想中蕴含的正义、人道主义价值。结果到20世纪70年代末,很多人在一接触到以电子表、蛤蟆镜、牛仔裤为代表的西方物质文化时便信心顿失,出现了所谓三信危机。^①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巧妙的、功能正常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应当向受众提供一个美好的许诺,因为非如此便缺少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个许诺又不能过分具体,以摆脱接受检验的责任,或至少是摆脱接受当下的、物质的检验的责任,因为大部分物质性的许诺都是难以兑现的。所以在中国,输入的讲天国的基督教与讲轮回的佛教比本土的追求平地飞升的道教取得了更大成功。^②高明的世俗意识形态如民主、法治、自由等也不承担检验义务,因为它强调更多的是终极目标、价值、程序而非结果。正如勒庞所说“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

① “人们的心灵出现空白时期,而对物质享乐的爱便乘虚而入,日益扩大范围,把整个心灵完全占领”〔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678页。

② “几乎所有宗教的创始人,差不多都这样说教。他们并没有向世人指出什么新的向善方法,而只是把目标向后移了。也就是说,他们把人们做出的牺牲的报偿放在来世,而不是放在现世。”〔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57页。

群众中扎根 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①

其次,即使真能做到永远第一、永远最富,成功主义意识形态也不会对所有人都产生吸引力。社会中肯定会有一部分人,例如,理想主义者或虔诚的教徒就不认同这种价值观,不以成功与致富为生活的主要目标。当多数人还在为温饱问题所困扰时,这种倾向可能尚不明显。小康之后,成功主义会受到更多挑战。这是它的一个内在悖论:越是接近自己的目的,它的吸引力便越低。

第三,也是成功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大不足,在于它不仅不能团结社会,造就和谐,反而会导致社会的撕裂,威胁社会的稳定。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应当能切实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自我实现。而要达到这个目标,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就不能太过功利切实,而要有足够的超越性,以消弭可能的社会分歧。任何国家或社会不论组织得多么合理,运行得多么顺畅;也不论它是多么的富庶,都不可能保证所有成员的成功。常识甚至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中,成功者永远都是少数,财富总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分配的平均。因此,一个合格的意识形态或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便是让社会中的弱者、失意者得到一定的安慰,而不至于对成功者乃至社会产生怨怼,从而将社会团结起来、粘合起来。当我们把成功主义夸张到绝对的、荒谬的程度时,便构成了对弱者和失意者的双重摧残:他们在对物质或成功的追求中已经失败了,在精神上、价值观上还要再次承受蔑视与打击,甚至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都受到威胁。在此种情况下如何希望他们和谐?对他们而言,维持、珍视这个社会秩序的理由与动力何在?

人道主义^②的真谛不仅在于对社会成员的各种有形的关心,尤其在于对他们价值的承认。每一个人的价值都不可替代,是最高命令。人的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与手段。

成功主义是典型的力量逻辑、强者逻辑、英雄史观,它的核心精神便是冲突性的,是挑动人们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它是典型的零和游戏:多数人的失败是少部分人成功的前提与基础。强者通常早已窥破底牌,根本不会相信、也不再需要任何超越性意识形态。而真正需要其安慰的恰恰是经常失败的小人物。在相当程度上,失败感是对人性的最大戕害,是对人的尊严的最大侮辱。如果主流意识形态给人生提供了其他价值,则失败者还可以自我安慰乃至自我解嘲为是志不在此,是在“伏孤清以死直”,有所不为等等,还可以找到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但在成功主义的逻辑下,社会评价及自我评价的标准高度单一化、高度清晰,“科学”得可以测

①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② 阿尔都塞曾谈到,“人道主义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27页。

量 这一切解释便都成为了阿 Q 精神。

但问题是,当一个意识形态抛弃了一部分人时,也就不可能指望得到被轻视者、被抛弃者的认同。所以成功主义意识形态其实是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在思想领域中的马太效应。它不仅不能缓和、弥合社会矛盾,反而会激化它。尤其危险的是,它甚至可能使失败者泛化自己的不满,产生对制度、对社会的怀疑,因此成为民粹主义、暴民主义倾向的温床。目前有人为之忧心忡忡的“仇富、仇官心理”便是一例。

即使不谈理念上的是非,而只在所应当承担的社会功能及其实践效果的角度上讲,这种虽非官方刻意提倡,但又笼罩着当下中国社会的成功主义意识形态,也实在是一种集合了各种可能想象的不足而无任何可取之处,愚不可及的设计;在意识形态史上拙劣得罕有其匹。它使执政者永远处于第一线,任何失误乃至不足(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做到零失误,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所有世俗要求)都会直接联系到权力的合法性,而失去了某种政策失误的缓冲地带及不满情绪的减压阀(如果有一个超越性的共识,则人们尽可以指责某个政治家,但不一定会质疑体制本身)。它使人们的生活紧张、浮躁、急功近利、粗鄙乃至惶惶不可终日。每个人都在盯着他人,为他人的成功而心绪翻滚或为他人的失败而幸灾乐祸,却失去了自信、自尊,失去了幸福感,失去了一切艺术、学术、创新所必须的安静、闲暇与平和。^①它使社会中的道德不彰,因为道德的前提一对本身欲望的抑制及对他人特别是弱者的尊重与同情——在它的逻辑中没有位置。

参照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在富庶程度上,如果不突出强调分配的平等,我们已经生活在盛世。但如以祥和、安宁、自信、幸福等为指标,则我们又似乎还没有看到盛世气象。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四

虽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成功主义意识形态的种种弊端,但笔者的学问见识又远不足以提出替代之道。移风易俗从来是圣人的事业。

但也许我们能在现代比较成功的例子中得到一些启发。当我们说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时,是说其各种类型的核心密码少有变化。至于外观形式或表述方法,则在不断地花样翻新。因此,研究现有意识形态的得失利弊加以借鉴,其意义并不下于创立新的学说。狂傲如龚自珍,也还是“偶而”承认“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

^① 子曰“仁者静。”见《论语·雍也》。柏拉图认为“在自由和闲暇中培养出来的……是哲学家。”见《泰阿泰德篇》前引书,第698页。柏克则引用了《传道书》中的箴言“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人,就会变得有智慧。”见(法)托克维尔《法国革命论》,第65页。

时丹”。^①

在时下的中国，“科学”有着甚高的权威性，或者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表述：某件事之所以办得好，是因为经过了科学决策；某件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违背了科学规律。“赛先生”成为了朝野公认的检验标准。

但细细分析，如果将科学作为意识形态，则它有着与成功主义相近的不足。首先，科学有被功利化、实用化理解的可能。如果我们像波普尔那样，将科学定义为假设、求证、证伪的循环试错过程，科学不是一些定理、结论而更是一种求真精神的话，那当然不会有此危险。^②但对于讲究立竿见影的国人来讲，它很容易被等同于时时需受实践效果检验的技术，而缺乏超越性的目标功能。^③其次，一般说来，科学只有在自己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其他领域中，例如在艺术、宗教、伦理、道德、爱情等领域，它的权威性就未必有说服力。按照科学的原则，宗教是迷信，伦理道德不一定有理性基础，而爱情也不过是人们大脑中某种化学物质的作用。但谁又能忽视这些“不科学”的东西？从经济的角度看，泰罗工作法无可非议；从现代政治的角度看，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恐怕还是应当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科学的归科学，其他的归其他。第三，对于最需要意识形态作为心理支撑的社会多数，科学有时可能过于冷静直白，缺少必要的安慰与包容。如前所述，多数最易接受的平等原则就与科学观察到的事实未必相符。人们在智力、体力等方面都不平等，在经济地位、教育水平等方面差距更大。因此人生而平等是一个完全无法“证明”的命题。但民主意识形态的基础正是这种假设，是要把在科学意义上不平等的东西依平等原则来看待、对待。两相比较，“德先生”与“赛先生”谁更能够争取民众岂不是一目了然？

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为各种定语、各种“主义”所修饰。但在政治—社会的层面上，它是一个民主或平民的时代。平民在所有时代中都存在，现代的平民在何种意义上主宰着政治也有待讨论，不同的只是他们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与重要性有了质的提升。这个时代约略起于北美独立战争及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对其特征的感受与描写最为深刻、贴切。他认为，西方几百年来政治、社会中的各种因素都在促进平等的产生。所以“平等的逐渐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

① 参见龚自珍《己亥杂诗（四四）》。

② 然而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的标准即在于可证伪性。这与意识形态的功能要求又完全不合拍。

③ 即使是神祇，如果不谈精神的、来世的救赎，只是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也无法维持人们的信仰。法国学者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在谈到古希腊宗教的世俗性时举过这样的例子：“在打仗时人神一同冲锋陷阵，彼此支援，争取胜利是人神应尽的职守。反过来如果战败了，神就难辞其咎，被认为他们未尽护城的职责。甚至有的时候，人们会推翻神坛，向庙里投石头。”〔法〕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治研究》，谭立铸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有求必应”原是过于沉重的责任。

历史的未来”。^①已经来到的这个时代的核心理念是身份的平等。这“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②“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③半世纪之后的勒庞,也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目前,铸就各民族命运的地方,是在群众的心中,而再也不是在君王们的国务会议上。”“群众势力开始不断壮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的传播。”^④

显然,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最能够迎合平民口味、最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便是包含平等思想的意识形态,无论是民主还是社会主义。

西方右翼理论界经常将民主与社会主义解释为两种互不相容、无法调和的流派。哈耶克就曾明确指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⑤这种判断是否成立,不是本文讨论的主旨。笔者只是想指出,作为意识形态,特别考虑到其受众,则二者大有相通之处。民主与社会主义都是平民时代的产物。它们理念的基础都是平等,而这正是弱者的主张,或至少是对弱者的同情。只不过民主的诉求是人们在身份上、在政治上的平等,而社会主义的理想是人们在经济上、社会上的平等。^⑥它们所依托的力量,都是作为多数(经常是弱者的同义语)的社会群体。民主是贵族政治、精英政治的对立物,社会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民主与社会主义都可以被理解为用弱者在人数上的优势来限制强者在质量上的优势。事实上,不伴随相应社会政策的民主经常是虚幻的,而现代民主制的核心环节——普选制——又成为执政者推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平等的社会政策的直接动机。

民主与社会主义都带有相当的超越性,指出了人类历史的目标,强调了自己的价值观意义,而没有过分纠缠于实用性与效果。福山在论证民主的优越性时承认:“对民主这一现象,我们如果只从经济学上来理解,显然无法作充分的解释。”^⑦因为“实证研究已经证明,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方面比民主国家干得更好。”^⑧民主化潮流之所以在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席卷全球,

①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8页。

②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4页。

③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21页。

④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3页。

⑤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⑥ 阿隆干脆认为这两个层面的平等其实都是民主的内容。“民主这个词的含义是社会地位的差异逐渐消失和生活状况趋向于拉平。”(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周以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⑦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⑧ 同上书,第138页。

更重要的是有赖于民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合理性与吸引力:它的基础即人生而平等,满足了人类的精神需求(也是更为重要、更为深层的需求):获得他人及社会的认可。同理,社会主义也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或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它首先追求的是社会上的相对平等,是消除因过分的贫富差距而导致的种种罪恶。“社会主义是一种对社会现状的批评,是改善这个社会的道德意愿。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幸福的人与不幸的人;巨富的人与赤贫的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这种状况必须改变。”^①它是单纯经济伦理、“成功”迷信、力量逻辑、英雄史观的对立物,是对社会公正、个人有尊严的生活与选择的保障。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而社会主义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在尽量保证你比过去过得好的同时,首先通过国家、社会的力量,使你不至于与其他人的生活有太大差距。我们因此十分清楚地观察到了民主与社会主义在原则、精神上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在追求平等,政治的或经济的平等;都是对弱者的同情与保护,使他们在强者面前不至于丧失尊严、任人宰割;都是力图用人们的理想与努力来对抗、改变不平等的所谓自然秩序;都超越了冷酷的成功逻辑,强调宽容与同情,将人作为目的而不是简单的工具或手段,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倾向。

因此,这种既适应人类心理、又符合功能要求的意识形态在平民时代中获得普遍认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们并且有理由认为,它的影响力还会不断扩大,直至形成价值观的再生产。

既然我们如此重视成功,那么这种成功对我们是否有所启示,是否值得借鉴?

^① M. Agulhon, “Qu’est-ce qu’être socialiste en France?” in Pierre Bezakh, *Histoir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 Paris: Larousse, 2005, p. 6.

An Analysis of Hezbollah'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Lebanon *Li Fuquan* (46)

In the 1980s, Hezbollah in Lebanon placed itself as a purely militant group outside the state power structure and focused on activities against Israel. After the Lebanese Civil War ended in 1990, Hezbollah participated i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to meet the situation changes and transformed itself into a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y i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tage. Since 2005, along with Syria's withdrawal, Hezbollah has changed its policy again and fully participated in domestic politics. With the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i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ezbollah has now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force in Lebanon.

ARTICLES

Ideology and Its Dilemma in Contemporary China *Xu Zhenzhou* (60)

At present, Chinese society is enveloped in an ideology of "triumphalism," which lacks transcendent goals. Material forms of success serve as the standard of measurement for everything, becoming the sole value and meaning of people's lives, and the basis for legitimacy. This ideology co-exists with the official ideology that is on paper. However, the former has formed a de facto deconstruction of the latter. The ideology of triumphalism cannot be tested. It does not hav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cannot resolve social conflicts, and does not meet the trend of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Moreover, it runs counter to all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a qualified ideology.

An Exploration of China's "New Diplomacy" through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Gao Fei* (76)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China's "New Diplomacy" is embodi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security cooperation,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CO has combined agendas of games of great powers,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s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The goals of the SC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Diplomacy" are in conformity and include the following: gradually and steadily developing practical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within a multilateral framework; continuing dialogue, instead of confrontation, with other global powers, and boosting regional prosperity stimulated by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Thoughts and the Chinese School of African Studies *Liu Hongwu* (89)

In recent years, the issue of development in Africa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African cooperation have become areas where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s encounter and collide.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